

二

伪满傀儡官吏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7; 277: 1033-1037.

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①（节录）

爱新觉罗·溥仪

一、不静的“静园”

1929年7月，我从“张园”迁到新租的“静园”。这是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把它改了一下名字，是有一层用意的。

静园里天天盼着变化和时机，果然，盼了两年，盼到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在日本读书的我的弟弟溥杰正准备动身回国过暑假，忽然接到了吉冈安直从鹿儿岛寄来一封信，请他先绕道到他那里，盘桓数日。吉冈安直曾经是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讲时局，同溥杰也算是认识，这时是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少佐大队长。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吉冈夫妇的殷勤招待。溥杰在那里玩了几天，临到告别的时候，吉冈非常神秘而又郑重地对他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像话，满洲不久或许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令兄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7月10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过了不到两星期，23日这天，“静园”又出现了两位日本客人，其中的一位是日本前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向我访问。陪坐的是郑孝胥和溥杰。在这次似乎很平常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很平

^① 本文是作者《我的前半生》修改稿的第五章。

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写着据说是日本南北朝时某位“忠臣”送给他的处于幽禁中的君主的两句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这时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北的日军增调，日本报纸借口“中村大尉事件”叫嚣着要对中国进行“膺惩”，而我的“复位登极”的美梦已连续作了几夜。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某方面的授意，还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对我都同样起了行动信号的作用。

“静园”在“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动态，在郑孝胥的日记里留下如下记载：

“乙亥初六日（9月17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驥业（陈宝琛之甥）、郑垂（郑孝胥之子）往大连……”

丙子初七日（9月18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9月19日）日本《日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3时23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大七（郑垂乳名）往访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戊寅初九日（9月20日）诣行在，进讲。报告日军据沈阳，同时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

己卯初十日（9月21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不抵抗。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佟得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我本来一听见事变消息，恨不得立时就奔到东北。但是这样的事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用不着太忙，日本人迟早会来找我的，现在不妨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派了刘驥业去找东北的日本头目本庄和内田，同意了佟济煦联络东北“遗老”，同时商衍瀛继续找

原与我有交情的东北军将领，如张海鹏、张景惠等人。前往办理“及时应为之事”的去了不久，不出郑孝胥所料，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那是9月30日的下午，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青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即刻去司令部，谈一件重要事情，并且告诉我不要带随从。我怀着“喜事”来临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浩平正在他的官邸门前等着我。行过了礼，立即匆忙地告诉我，从满洲来了两个人，要求在他的兵营里向我朝见。说着，领我进了他的会客室。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穿西服……是关东军板垣参谋派来的代表，名叫上角利一。

香椎介绍完毕，离开了客室，屋里留下了我们3个人。罗振玉向我恭恭敬敬又行了跪安，然后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

寿时都向我谈过。但在郑孝胥、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认为他是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特别是1928年的“迎驾事件”^①，我的记忆犹新，因此对他不抱太大的希望。这回他来的却是时候，说出的话不容我不相信，因为不仅有照治的亲笔信，更有关东军赫赫有名的板垣大佐的活信——上角利一。上角向我转达了板垣的意思，说“关东军没有领土野心，这次不过是为了保护日本应有的权益”。关东军“诚心诚意地帮助宣统帝恢复自己的国土”，希望我立刻动身前往大连，然后转道进“盛京”。关东军连沈阳的旧名也给恢复了。

在会见罗振玉和上角的头一天，郑孝胥刚给我看过一份大连报纸，上面有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消息。郑孝胥同时拿来的还有他的孙子从伦敦寄来的剪报，评论一个英国少年在中国失踪，说“民国显然不足信任”，并说美国官场并不以为日本在满洲的举动为违反“凯洛非战公约”。这些议论和英国在讨论东北事件的“国联”大会上袒护日本的消息，以及蒋介石一边说抵抗，一边宣称为“逆来顺受”，并且节节后退的消息，对我表明情势对日本人是利，因此对我说来也是有利的。我认为时机确实是到了，一掷妥善，只待我出山了。

二、形形色色的想法

我心里一团高兴，但我还能矜持地对罗振玉和上角说，待我回去考虑一下，然后答复他们。

在回国的车上，我计算着“复位”的时间，幻想着“大典”的场面……我越想越高兴，浑身好像都着了火。但是回到

^① 这年夏天，罗振玉、谢介石等人说日本政府来人欢迎我到日本去，我向日本领事加藤讯问，却说并无其事。那次他也是说日本将派兵舰来接驾。郑陈等对罗大肆抨击，我对他的印象也很坏，第二天他便搬到大连去了。

静园，马上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就是我的师傅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我把会见罗振玉的情形告诉了他们，他们立刻认为罗振玉又犯鲁莽乖戾的旧病，而关东军一名大佐，也不是能办得了这样大事的人，何况派来的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现在东北的治安情况，民心的向背，日本最高当局的政策，世界列强的真正态度，都还没有摸准，决不能贸然应允日本兵营的那两个冒失鬼，至少也要等刘骥业回来再说。84岁的陈师傅后来竟沉痛万分地说：“但愿皇上不承担任何风险，倘若贸然巡幸关外，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正当我浑身发热的时候，听了这种话，心里颇不痛快。我把陈宝琛的慎重看做是衰年的暮气。我叫人把一向主张“激进”的郑孝胥召来，再看他是怎么说……他沉吟了一下，虽不像陈宝琛那样的反对，但也露出一付慎重的神态来说：

“辗转相随，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皇上也不得收场。不过，是否立即启驾，还可考虑……不妨等佟济煦回来再说。”

真没想到，他也给我泼了一勺冷水。好像整个静园除了我自己以外，再没有一个对日本兵营的消息感到高兴的。

事实上，他们没有一个反对复辟的。他们大体上是出于对两个问题的考虑，即时机是否成熟和罗振玉究竟是如何打算。陈宝琛主要考虑的是前者，郑孝胥考虑的几乎完全是后者。

……

郑孝胥最怕的是罗振玉会把我弄去垄断居奇。陈宝琛在这点抓的倒不多，或者说，还不如他的信徒胡嗣瑗、陈曾寿抓的多。胡陈等人这方面的考虑还是后来暴露的，而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怕时机不熟，功败于垂成……

而郑孝胥，虽然也叫佟济煦去东北摸情况，叫郑垂广泛搜罗、研究中外报纸，但他大致是认为时机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可以说，他不但认为我这块招牌日本人必定要用，而且认为其他“列强”也会发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开门户”以广招徕的政策已到了实现的时机……

这就是当时我的“股肱”们的各种不同的想法和言论。比较起来，郑孝胥的议论除了对罗振玉的批评之外，是更打动我的心的。但是从日本兵营回来之后，他的反应也令我不能满意。我这时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我的皇帝瘾已发作起来，一切反对动身的理由我都是听不进的。

想不到的是，我会见罗振玉和上角的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泼冷水的，这却是来自日本人方面。

三、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对出行事商量出一致意见，第二天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就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认为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来直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但是另一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最好是立刻动身出行，日本军方是决心支持我上台的。

我在天津住了7年，对日本军政方面的摩擦、猜疑，多少是有点知识了。这时我对于军政双方的“发言权”，也有了新的看法，这是和陈宝琛那一伙人不同的。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的朋友是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专门和

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定认为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就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不同，认为能决定我的命运的，现在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凭着直觉，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另方面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着，攻打着退却中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这同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也和我的直觉印象不同。

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谟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向我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谟德，愿意充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不仅使我飘飘然，并且更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祖日的消息。牛谟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为了代表英外交部来和中国政府办理中英庚款和归还威海卫的遗留问题，因此顺便前来看望。他也为了我的“前途”表示高兴。他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序文，他说将在这书的最末添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这时，刘驥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励。佟济煦先回来，说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铠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是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驥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说的尤其充满了乐观：“奉天一切完备，惟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的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

人是随时可响应复辟的。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是促使我急于动身的因素。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真是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登出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静园里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但是，尽管我一心想走，我毕竟是日本行政当局的客人，必须和总领事馆说通了才能行。我派了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我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认为并无危险，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还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这个消息令我非常糊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问问。不料吉田回答说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是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的。他给我出个主意，亲笔写封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糊里糊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道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这件事，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问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日本军政两方的这种意见分歧和暗中摩擦，令我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骥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见是：现在东北三省还没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指我）临幸沈

阳”，请我暂时在津等候着。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也只好遵命静候“佳音”了。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是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不由得对某些现象有点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臧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等等。这些不能和我并立在一个屋顶之下的“牌位”，日本人正作什么打算？但是我还不明白，日本人长期豢养着的有各式各样材料，我这个被尊敬地称为“陛下”的，不过是其中之一，不可用，用我还是用别的，还都在主人的考虑之中哩。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这是最近从一篇文史资料稿上才看到的），又一度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这是我到东北之后听到的），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等候佳音”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怪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并以美玉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建议，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王公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了人去到日本进行活动……派了我父亲家的家庭教师日本人远

山猛雄到日本，向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进行活动，同时也找过大阴谋家“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毛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

我就这样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之后三个多星期，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当时郑孝胥在日记中有以下记载：

“九月辛酉二十三日（11月2日）诣行在。召对。上云：‘商衍瀛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速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私商，谓宜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果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

四、会见土肥原

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作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1913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担任着许多北方军阀的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10余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1924年奉直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1928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时期。除了伪满的诞生之外，1931年11月的天津骚动事件、1932年热河战争的爆发、1935年5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11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到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

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走当了不多时间的旅团长，又调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分，统帅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中国大陆和南洋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到十年间，由大佐升到了大将。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是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

他那年是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3 000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蒙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

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对于罗振玉和上角之所以不能相信，一是怕他们不能代表关东军，二是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更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解决。我问他：

“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作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大清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大清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大清帝国，我就去！”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又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因此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了。

土肥原走后，吉田告诉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领事馆；关于动身的事，自有他为我安排一切。我也决定，除了郑孝胥父

子和几个“随侍”之外，别人一律不带，也不和任何外人透露。

但是，这种事是任何人都瞒不住的。这消息比上次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发出了土肥原与我会见的新闻，揭露出了土肥原此来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不在天津，从北京得到了消息，立刻赶了回来，下了车直奔郑孝胥的家，打探消息，然后又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去东京活动的刘骥业拍来了一个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陈宝琛，并且答应即刻和大伙再商量商量。

这天是11月5日，静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等人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铁良。别的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郑孝胥和陈宝琛两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伤尊害礼”的地步。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主张启驾之议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瞪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是持重！”郑孝胥瞪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或者颇为热心，无奈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上头三思而定。”陈宝琛向我说。

“日本内阁不足道！”郑孝胥也转头向我：“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再思三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是请上头三思，不是请你郑孝胥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了上去，我们为臣的将陷上头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成固然好，倘若不成，更陷上头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

列祖列宗！”

“等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既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唾星飞溅下，陈宝琛脸色苍白，扶着桌子颤巍巍地站立起来，让自己上身尽量凑近那秃顶，冷笑了一声：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进退，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不语的铁良，以及够不上说话只会喘着粗气的胡嗣瑗，觉得不能再保持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了些“从长计议”的话，透出的意思是支持陈宝琛，铁良嘟囔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胡嗣瑗是满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的远不如他写的能叫人明白。我是一点不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迂腐不堪，忠心可嘉”。

我拿定主意，不表示态度，不暴露已下定的决心。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更是如此。

在陈宝琛和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了特殊礼物。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中听着“进讲”，“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忽然我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进来说：“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我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礼物扬长而去。祁继忠接例检看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手榴弹。

在“静园”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军参谋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通译官前来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判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我说：“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后来听说，第二天有的报纸上刊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布置的，可是我没看到这份报纸。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份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慌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极吓人。有一封上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的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我认识的一名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位关心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人衣服里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还认出来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变”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我出宫时和他有一面之缘——从11月8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附近开来了担任保护之责的日军铁甲车。于是“静园”与外界隔绝起来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孝胥父子二人。

后来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去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我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原因，而仅仅是由于怕我再变了主意，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自己已下定了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我会见了土肥原那天起，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的主张，也认为必须主动一些了，不

过还把希望放在日本政府方面。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我一样，是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同时又担心羊肉吃不成反而惹一身骚。这些对于和日本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所热衷之处。我关心的是怕当不上皇帝，他们怕的是做不上大官，因此力主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作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

五、白河偷渡

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11月10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的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很使我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我叫一个随侍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个办法，把我藏在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对他说“上头”的命令叫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去，那里有人等着。就这样，祁继忠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直奔我和吉田商定的地点——曙街一个日本餐馆“敷岛料理店”。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所以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

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敷岛料理店的门口了。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又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在没有任何局外人在旁的情况下，吉田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一下，然后带着我、祁继忠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顺着白河岸走了一阵，到了一个码头。

码头上很清静。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不禁有点发慌。但是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我快步走了一段路，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了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里面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名叫谭访续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船。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上沙袋和钢板。过了20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着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截获时，日本军人就放起火来，连船带人一齐消灭。可是当时我的屁股离开汽油不会超过3米，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昵！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开了码头，开了电灯。我凭窗眺望河上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来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底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

发过幻想，把白河看作我将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宿愿将偿，高兴得不禁有些手舞足蹈起来。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快过去了，前面是中国军队的势力范围，军粮城那边有中国军队守着。”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三个日本冒险家，面上也都现出不安之色。大家沉默着，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忽然听见岸上传来一声吆喝：

“停——船！”

拉得紧紧的神经好像被这声吆喝一下子切断，我几乎瘫痪在座位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匆匆地走上甲板。甲板上面响起零乱的脚步声，低低的口令声。我从窗口探头出去，看见沙包和铁板后边都伏着人，端枪作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船的航速好像正在下降，航向也偏向岸边，我正惶然不解，忽然机舱里响声大作，同时电灯全熄，船身突然加速，岸上响起了喊叫声和随之而来的枪声。这时只觉船身一歪，像跳起似的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和枪渐渐在后面消弱。原来老于此道的日本人早准备了这一手，先装作从命的棒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地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电灯又亮起来，舱里渐渐有了活气。到了大沽口，在等待“渡路丸”商轮出口来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菜和日本酒。郑孝胥活跃起来了，一杯酒下肚，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喷出了唾沫星子，高谈其“同文同种”“同舟共济”之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着杯，即兴成诗一首：

“同洲二帝欲同尊，六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印文是“不忘在莒”和“溲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记着他和我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借刘秀败走溲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作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这次叛国投敌说成清朝中兴，将我比作刘秀，他自己自然是以劳苦功高的大树将军自居了。

郑孝胥这晚上的兴奋，除了由于他在我周围一群人之间，又成了一个胜利者之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是他从日本军政双方表面摩擦分歧中，比别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实质上的一致，这是我最近才从他的日记上找出来的。在我会见土肥原的次日（11月3日），他的日记写着：

“大七（郑垂乳名）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天，领事馆可阳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有11月6日外相币原致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秘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对外的关系反会不好……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自然，也无不可。”

六、在封锁中

在“淡路丸”上听郑孝胥讲了一整天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13日的早晨，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想象

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这个人当时中国人知道他的不多，他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关东大地震，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对于日本进步人士进行谋害。这次遭难者之中，大杉荣夫妇和7岁的孩子就是死在甘粕正彦的宪兵队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甘粕正彦充当替罪羊，交付军法会审，处以无期徒刑。过了不久，甘粕获得假释，被送到法国去念书。甘粕正彦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戴细腿近视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

甘粕正彦没有讲什么话，就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的火车，又换马车，这样稀里糊涂地就到了离营口约有百里的一个叫汤岗子的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

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一所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才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的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我见着了罗振玉、商衍瀛和佟济煦。看见了他们，我立刻高兴起来。罗振玉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

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清的了。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听了罗振玉说话之后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这个风景区的夜色，然后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是乐得太早了。

次晨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祁继忠，说我要出去溜达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不行呵，不让出去啦！”祁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连楼也不让下呵！”

我这时才知道，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来，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罗振玉已不知何往。他又怎么可以出去呢？郑孝胥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带头的就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祁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眯眯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这是为了安全的，为了宣统帝安全的。”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不耐烦了，问道：“照给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照给要接我到奉天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词地回答说：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济煦，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人的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衍瀛他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乱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这时我不知道，日本人正忙着，日本在国际上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什么形式统治这些殖民地，意见也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不过我已经感觉日本人对，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我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

一切也都很方便。我听着也有理。这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作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的。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捺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着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我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我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的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

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我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我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开（这种行为在郑孝胥父子身上越来越明显），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则防范得很严密，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叫他随后来找我，并叫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她拿出了那时候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我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我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我身边来，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得见。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去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倒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我，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我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因此我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

人，一五一十向我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我，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我，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大军机。陈曾寿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作上官。这些纸上谈兵的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经我要求，给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他不干走了；后来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又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作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作不成了。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已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郑接近全胜——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法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我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撵走了。

天津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作，借口服侍我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通过拦阻。只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这些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想到我身边沾光，由于没有军方后台，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对冤家面临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出毕生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即实行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特有首倡“迎立”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我家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提出了要大清复辟，至少也要我作满洲一隅的皇帝（在我还没有到旅顺以前，这个谈判刚刚开头），日本方面对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和我一样地不明白，复辟的作法 and 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不是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合法的时候，因此关东军也不急于定案。暂时还是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我身边原来的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身边，也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既居于独家经理的身份，可以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交涉着。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正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竟然失效，关东军方面指名要郑孝胥去会谈。原来，在天津的

时候，罗振玉刚走，郑孝胥就结识了上角利一，用他搭成了自己与关东军间的桥梁；何况郑的儿子郑垂本来就和天津日军的参谋们有来往，郑氏父子到营口旅顺之后，又和甘粕正彦屡次进行过“谈心”。于是关东军很快对他父子有了了解——不只了解到他的影响，也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了。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1932年1月28日在旅顺），听板垣说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起初也很惊讶的，曾劝我不同意，向日本人表示了“共和之制断不可行，假共和尤为不可”。可是后来他明白了日本军方一定不肯给我一项皇帝的帽子，知道了这个“标底”，他马上改了投标价码。据说这件事是他儿子给他办妥的。不知靠了什么机缘，郑垂勾搭上了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他代表他父亲向驹井表示，如果日本方面认为“帝国”的称呼不适合，只要同意他父亲担任未来的内阁总揆，一切没有问题，他父子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谓。顺便说一句，这时抢首揆这把椅子的人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人。熙洽几次派了谢介石送钱给我（大约3次，共约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这也是一个压力，所以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袖筒里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由板垣的客人变成本庄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被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

七、我的所见与所思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

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么要请我到满洲来复位和主持大计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确实没有说谎，他说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的人商量，没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的话了，但除了听他们的话以外，也毫无办法，因为我身边没有另外可以商议的人。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的指点的情形下，我曾经采取过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把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打开，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地在郑罗和诸葛神课的一致劝导下，捺着性子等待了。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倒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给马，劝他归顺。我说在天津时我已写了一封，不过如果认为必要我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关东军叫我劝马占山归顺，显然证明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也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对于等待倒比较安心了。

这样地等了3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1932年2月19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是刚刚复

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2月18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敌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2月19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可以说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起恐慌而又十分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多高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一趟，也是由于听到了这个风声，所以才特意来给我作一次最后的教导。他说：“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咒骂着土肥原，咒骂着板垣，咒骂着关东军。一个瓷茶杯在我的恼恨下变成了碎片。当然，这些举动都是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形下发生的。陈宝琛师傅给我的教导，这时充分发生了作用。我一走出我的寝室，立刻能作到喜怒不形于色。不但如此，我还从随身带来的小件珍宝玉器中挑选了几样，交罗振玉给板垣作讨好的礼物。另外就是根据陈宝琛上次给我进行的最后一课教导，把我认为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亲笔写下，交给郑罗，要他们拿给板垣看。这时板垣正邀请他们到沈阳会谈。

我写的那些理由共12条（后4条是陈曾寿后补上的）：

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

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

三、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

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尊崇固有之道德，使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

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利者，其多数人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

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

七、共和制度日炽，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实有莫大之隐忧，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统系。

八、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在满洲有百余年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谕群工，莫不推扬道德，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濡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死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捍头目，此予之所敬佩者。为趋步明治大帝，不能不正统系。

十、蒙古诸王公仍袭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由统制之，

故不能不正统系。

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惟予之志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予虽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乏，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用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弊政。否则有名无实，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谢迹，一旦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太局起见，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

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他的命运的决定关键。因为关东军在拿出所谓国体问题的定案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之前，要最后排定“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的意思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怀疑，不让我去沈阳。等到他的目的已达，再从沈阳回来的时候，他就不管我这一套了。陈曾寿（当时也住大连）的日记里曾记下：

“十七日。……苏龛（郑）、叔言（罗）自奉归。此次郑氏父子充代表赴奉，系日军部邀请，上加派。雪

堂。(罗)到奉后，苏龛出席，上所命传之语，一字不提。言：‘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内幕，但是郑孝胥由力主保留“国号”一变而为向我“极言当借力试行”，即所谓借日人之力试行先当一下没有“宝座”的“满洲国执政”，这个变化就够我又惊又怒的了。当我一听他说出板垣执意不同意“大清复辟”，立刻跳起来问：

“土肥原说的不是大清帝国吗？连帝国也不是了吗？”

“连帝国也不是，这是‘民主制’，也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

“说什么‘委员会’！我用不着‘委员会’，我也不当什么‘执政’！如果这样，我可回我的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回天津是不容易了。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希望啊！”

他又讲了一堆历史典故，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听够了，而且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我再三不依，他却是胸有成竹。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吧！”我气呼呼地说。

八、会见板垣

板垣征四郎是1929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揭露，板垣在1930年5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

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1931年起，以大佐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他于1934年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1938年作了陆军大臣，1939年是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又作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树立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的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鼻子底下的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看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是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也很触目，这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是事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来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的。

他说出了题目，却不立刻讲正文，而是慢条斯理地先从“张学良的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又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青白脸和忠岛比多吉的皱脸，不断表示赞同地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正题，他说：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

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忠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执政即位宣言”以及设计好的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在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这些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仍旧用他那不紧不慢的声调说：“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这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委员会代表满洲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忠岛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日本人这样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200万平方里的土地和3000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我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唯有这个执政制我却是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若是由我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露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办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又像挨了一下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这样的争来争去，总也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也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12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反来复去地表示，非要这个皇帝的称呼不行。这样谈了3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也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冷冷地说完，他就告辞走了。

这天晚上，我又和板垣见了一次面。这是根据郑孝胥父亲和上角的意见，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瑗、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人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

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起怕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固然不能并列，不过谁知现在日本人心里又是怎么样的呢？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阴晴气象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他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那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似的。也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再不说别的。一直到晚上10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是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栻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他的“气候”：

“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作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

我愕然地看着他们每人的脸，看到罗振玉和万绳栻的神色，我相信郑孝胥传达的话不会是假的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别人都不言语，我只听见郑孝胥一人的声音：“臣早说过，不可伤军方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皇上必须乾纲独断。现在答应下来，将来开议会，还可以通过帝制，倘若贸然决裂……”

郑垂接上腔：“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他这个眼前亏，与其决裂翻脸，不如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策，谋来日之宏举。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接着又说一堆什么夏少康之类的老套，给我脸上贴金。他在昨晚宴会上，是最活跃的一个，不住地跟板垣干杯，宴会散了，他俩不知又找了什么地方

去续饮。他这种“通权达变”，据陈曾寿后来说就是在干杯声中产生的。

听了郑氏父子的双簧戏，我冷笑道：“你们说得容易，可是到了将来，议会通过的还是要大总统，又该如何？别的一切好说，唯有这皇帝称谓，是祖宗所遗，我若取消，是不忠不孝！”

“板垣说过，将来可以实行帝制。”郑垂声调委婉地说：“将来有机会。”

“将来若是没机会呢？板垣骗人呢？”

“那咱就走。依郑垂之见，决不至此！”

“走？要是走不了呢？那时有你一百个郑垂又何济于事？”

郑孝胥突然粗声地说：“可是现在伤了军方感情，一切全完！”

我抬头注视着罗振玉和万绳栻，希望他们发表意见。万绳栻满脸惊慌之色，好像郑孝胥暗示的危险已降临到他的眼前。罗振玉垂头丧气，连连摇头，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话来：

“事已如此、悔之无用。只好暂时……允许，以一年为期。若一年期满仍如其旧，再向军部提出，也是仁至义尽。”

“这是好主意！”郑垂赞许地说：“一年为期，到时再说。”

我还在犹疑不决，这时郑孝胥终于拿出了他的杀手锏来了：

“应断则断，当行则行。目前固然尊号未定，不过青云直上，为时也不会远。臣服侍皇上这许多年，为的是什么？眼看预期的事业，就可以顺眼前这条路，一步步达到，倘若执意不就，岂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既然如此，臣只有就此告辞回籍！”说着，他站起身来，就像立刻要走的样子。我着了慌，忙阻止他，说：

“你忙什么？商量事情要紧。”

就是这样，我一方面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想

着板垣许给我的未来宝座，公开地走上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给自己戴上了头号汉奸的头衔，给血腥的统治充当了一块遮羞布。在这块破布底下，从1932年3月9日所谓“执政就国”这天起，祖国东北三千里江山变成一块完全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灾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土肥原之流扩大了嗜血的胃口，奠定了这撮人的“发家”的基石。郑孝胥的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等人的命运关头：

“……上乃决，复命万绳栳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句。板垣退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垣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

板垣在这天晚上，特别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庆祝宴会，把我们这伙软骨动物都请去了。板垣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叫来一群日本妓女，给每人配上一个，他自己左拥右抱，大吃大喝，斯文像全没有了。

一个日本妓女拿了一杯酒给我，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是中国人的？你是做什么的？”

板垣听见了，放声大笑，把那女人吓了一跳，惊慌地缩了一下脖子。她在转顾之间，那个敷满白粉的脖颈，引起我对于瓷制品的感觉，我因之忽然想到，我这“临时执政”也是瓷制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摔个粉碎。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